



# 戏楼·戏台·戏魂

赵威



天津城里,有座广东会馆。门脸儿不算张扬,藏在闹市,自有一股沉静气质。迈过那高高的门槛,周边瞬间就安静下来,外面的喧嚣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天井敞亮,廊楼幽深,木雕、砖雕的花鸟、人物很是鲜活,仿佛随时会扑棱棱飞下来。我的脚步不由得放轻了。

引路的是那隐约的锣鼓点儿,丝丝弦像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人往里走。到了正厅,那戏台便整个儿地矗在眼前。这戏台和如今人们见惯的舞台不同——不是远远地隔在幕布后头,供人仰视,而是大大方方地“伸”出来,坦坦荡荡,无遮无拦。人坐在底下,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那飘拂的裙裾,接到那抛来的眼风。台顶子更是奇怪,行话叫“鸡笼式藻井”。仰头细看,那层层叠叠、螺旋而上的斗拱,果真像个巨大的、精巧的笼子,倒扣着,却又轻盈得仿佛要浮上去。没有一根柱子撑着,成百上千的雕花木构件,就那么严丝合缝地衔接着,悬在舞台上空。光线从看不见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台上,格外柔和。忽然想到,从前那唱戏的名角儿,站在这样的台心,一开腔,声音怕不是被这“笼子”轻轻地拢住,聚着,酿着,然后才如醇酒一般,徐徐地“流”向每一个角落。这哪里是戏台,分明是一只收着岁月,聚着戏魂的神器。

正出着神,一阵清亮的童音,水珠子似的溅开来。又一幕演出开始了。几个画着脸谱的小娃娃,穿着略显宽大的戏服正有模有样地比画着。身段是稚嫩的,调门儿却拔得老高,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认真劲儿。台下坐着的观众,有人眯着眼,手指在膝盖上悄悄地打着板眼。这一刻,台上台下,老的少的,竟凭着这几句唱腔,

幽幽地通了血脉。我瞧着那被小脚丫轻轻震起的几乎看不见的微尘在光影里浮沉,忽然觉得,那尘里,或许也杂着梅兰芳、杨小楼当年踩下的尘呢。名角儿的精魂与孩童的生涩,就在这方台子上,完成了一场无言的交替。

我的双眼有些模糊了。台上鲜亮的影像,此时幻化出一片截然不同的、粗粝的光景来。那是我老家的戏台。

老家的戏台,没个正经名字。村东头,黄土夯实的台基,高出地面五六尺,三面也是空的,背面却只有一堵光秃秃的土墙,墙上用石灰水刷个方块,便是天幕了。它简陋得不像话,可它又是活的。一有戏,它便活了。那戏,我们那儿叫“肘鼓子”,也叫“周姑子”。乐器简单,坠琴、梆子、锣鼓都是破旧的,演奏起来咣咣唧唧,像是土地干裂的嗓子。唱戏的多是本土的农民,农闲时凑成班子。行头是黯淡的,水袖也短,甩起来不见飘逸,倒像在费力地对付什么。

我三叔,便是那班子里打梆子的。他不上台唱,可戏班子离了他,仿佛就没了心跳。开戏前,他总爱蹲在台口,就着一盏煤油灯,眯着眼,用粗布一遍遍擦拭那副油光发亮的枣木梆子。开戏了,他隐在台侧阴影里,脊背微弓着,全身的力气仿佛都凝在那两条胳膊上。他的梆子打得与众不同。急时如骤雨打窗,密不透风;缓时又如老牛反刍,一声,一声,沉沉地,砸在人的心窝里。台上旦角儿哭诉冤情时,他的梆子便是那凄凄切切的雨;武将厮杀时,他的梆子便是那咚咚响的战鼓。戏到了高潮,台上人一声裂帛般的高腔,他的梆子也恰时地猛一收,万籁俱寂,只余那颤巍巍的尾音,和台下看客们屏住呼吸的空白。那一刻,他不再是沉默的三叔,他成了那戏的筋、戏的骨、戏的魂!

那样的夜,戏台是村子的心脏。台上灯火通明,台下黑压压一片,人挨着人,呼出的白气混成一片温暖的雾。空气里有炒瓜子儿的焦香,有旱烟的辣味,还有一种热烘烘的气息。戏文无非是忠孝节义、才子佳人,词儿也是老套的,可台下人偏就跟着哭,跟着笑。他们看的不是戏,是自己心里熬着的那份日子。戏散了,人潮散去,满地瓜子皮和烟蒂。三叔总是最后走的那个,默默地收拾着家伙什儿。我帮他提着灯,昏黄的光圈只照亮脚下方寸地。回头望,那空了,哑了的戏台,黑黢黢地蹲在夜色里。那时我不懂,只觉得一阵空落落的凉。

后来,我走过天津地北的一些地方。常能在荒了了的村口或是庙前遇见那样的戏台。它们大多比我老家的讲究些,有砖砌的,有带着石柱础的,有的还残存着一角模糊的彩绘。台面上积着厚厚的尘土,枯黄的蒿草从砖缝里倔强地钻出来,在风里摇曳。有的台顶塌了一角,露出狰狞的木椽,像折断的肋骨。阳光直辣辣地照下来,照着那一片空洞与破败,没有一丝声响。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被遗弃的寂寞。这寂寞是有重量的,压得人心里发沉。这里也曾锣鼓喧天,也曾水袖招展,也曾承载过一个村落全部的悲欢与凝聚。而今,台下再无看客,台上再无伶人,只有岁月,用它无声的却最锋利的锉刀,慢慢地磨去它们最后一点温度和痕迹。

“您好,您这边,活动要开始了。”一声轻唤,将我从那无边的沉寂里拽了回来。我定了定神,发现自己仍在广东会馆这精美的戏楼里。台上,已换了一拨人,轮番表演着“京剧快闪”“戏曲变装”。年轻的志愿者们穿着汉服,引导着游人进行沉浸式体验。一些年轻人围着几位勾了半边脸谱的演员,叽叽喳喳,跃跃欲试。

我悄悄退了出来,跳回天井。阳光斜斜,给廊柱拉出长长的影子。那戏楼,静静地矗立着,飞檐勾着淡蓝的天。一边是精雕细琢,声光电里的热闹;一边是黄土蒿草,风中呜咽的寂寥。它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又仿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

我忽然想起三叔的那副梆子,在他过世后不知遗落在哪个角落了。那枣木的梆子想必早已枯裂,再也敲不出惊心动魄的声响了。那声音,曾从那样简陋的土台上响起,钻进我的耳朵,融进我的血脉。它和这古戏楼里童稚的唱腔,和那记忆中荒台上呜咽的风声,或许在某个我听不见的维度里,是同一种震颤。

只要还有一段故事在人的心里活着,那戏,便没有绝。

题图摄影:王爽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杆早晚钟声。”高挂于天津鼓楼之上的清代诗人梅宝璐(字小树)撰写的这副著名楹联,反映了曾经以鼓楼为中心点和制高点的老天津城厢的繁盛景象。

2023年9月,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正式发行。首套纪念章推出两种图案,分别为镀金、镀银材质,共四种。这套纪念章由天津鼓楼博物馆的主管单位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室创意,委托北京一家以文创产品知名的旅游文化公司设计制作,于方寸之间融合历史地标与城市文脉,兼具收藏价值和文化传播意义,甫一推出便赢得市民和游客青睐。

明代永乐年间天津设卫,初筑土城,后于弘

大,加设须弥基座、汉白玉栏杆,楼阁为绿琉璃瓦重檐歇山顶,古朴典雅,巍峨壮观。

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另一种图案为鼓楼铜钟。鼓楼旧时悬挂铁铸大钟,名为鼓楼,实是钟楼,乃钟鼓楼合二为一的公共建筑。大钟除报时功能外,还因鼓楼明显高于城内其他建筑而承担了一部分观测天象、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此纪念章上呈现的大钟,是根据旧时唐宋制式铸铁钟复制的,材质为响铜,钟上的铭文由作家冯骥才和民俗专家张仲撰写。在天津鼓楼博物馆里,人们不仅可以参观内容丰富的各种展览,还可以在高层环形露天平台饱览老城厢美景,更有机会亲自敲击顶层的巨大铜钟,这样独特的享受是一般博物馆所难以提供的。

天津建城六百多年来,老城厢一直是一块文脉发达的宝地,其中的文庙、学宫、贡院、书院、会馆、戏楼、学会、学校、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书肆、古玩店、邮币卡市场等,成为各个时期天津文化繁荣的标志。近百年来,老城厢也是中小学等教育机构的密集之地,这从我收藏的20世纪中后期发行的东南角中学、西南角中学、东门里中学、三十一中——崇化中学、中山中学、中营小学、草厂庵小学等学校的校徽和纪念章便可见。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明代正统元年(1436)始建卫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四百多年间,坐落在老城厢东门里的天津文庙始终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科举制度废除后,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依然在延续。1947年,李琴湘、孙正荪等创办天津崇化中学,1952年更名为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学,2006年恢复原校名。该校曾长期在文庙办学,其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两种纪念章上皆铸有文庙牌坊图案。

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广东会馆在老城厢鼓楼东南侧建成。中山中学原名普育女子中学、女三中、红军中学,现为天津九中,校址曾设在广东会馆。1985年年底,在广东会馆原址基础上成立天津戏剧博物馆,并于次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笔者收藏有铸有孙中山头像的中山中学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可以丰富广东会馆(天津戏剧博物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内涵。

题图为2023年发行的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四)

## 唤醒繁华老城厢

罗丹

治年间由兵备副使刘福嗣成砖城,修建城楼、角楼和鼓楼,标志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备。鼓楼四面设有拱形穿心门洞,早期楼高三层,上部建有木质双层楼阁,青瓦歇山顶。内部悬挂唐宋制铁钟,每日早晚敲钟两次,每次各敲五十四响,即梅宝璐楹联所述“听一百八杆早晚钟声”,作为城门晨昏启闭的信号。“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由此可见,鼓楼居于明清时期天津“三宝”之首。

八国联军侵华,天津城墙被炮火摧毁,鼓楼虽然幸免于难,但因年久失修,日渐颓败。1921年,鼓楼重建,将原天津城“匾额”“镇东”“定南”“安西”“拱北”移至鼓楼相应门洞上方,并由翰墨名家华世奎重新书写。1952年,为疏解城市交通,鼓楼被拆除。

2001年,伴随老城厢地区改造和鼓楼商业街建设,鼓楼得以重建。鼓楼博物馆开放后,基本陈列长期为“世纪危改成果展”。2016年提升改造,基本陈列变更为“老城遗韵”,展现了天津沧桑的历史变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连续多年的12月31日夜晚,皆有“鼓楼津声”跨年活动在鼓楼及其四面“场”区域举行。

天津鼓楼博物馆纪念章图案之一为2001年重建的鼓楼外景。与旧时相比,鼓楼体量增

腊月风拂过,夹雪含霜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我认真擦去门旁的浮尘,又将已微微褪色的旧春联轻轻揭下。空白的地方,在等着除夕夜前贴上的新联。

春联,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记。那一抹红,染热了多少人寒冬里对春天的期盼。父母亲都没有读过书,却对春节贴对联一事分外讲究。我记事时,大哥已能提笔撰写春联,这是令父母十分骄傲的事。每年小年后,大哥写春联是我家过春节的重头戏。一向节俭的父母此时格外大方,买来很多红纸,裁好,供大哥使用,不仅仅是给自己,还有街坊邻居,家家不落。鲜艳的红色把一张张的笑脸映得通红,墨香与年味在街巷里弥漫开来。

贴春联,是中国人郑重举行的春节仪式之一。它的根藏在秦汉的桃符里。古时先民以桃木为符,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悬于门侧驱邪避灾,这便是春联的雏形。到了五代,后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字句间褪去驱邪的凌厉,增添了节庆的温婉,后世认为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春联。宋代以后,笔墨间的内容愈发丰富,从祈福纳祥到咏物言志,春联成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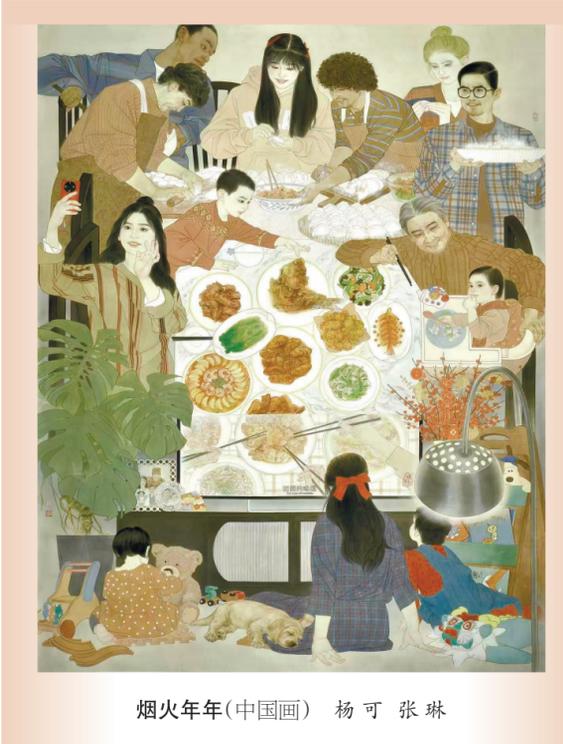
## 红联新禧

王霞

人雅士与市井百姓共赴新春的愿望载体。那以后,红联墨字间更定格了无数家庭的美好寄望。

岁月流转,春联的样貌在变,不变的是藏在其间的心意。过去的春联多为手写,文人墨客挥毫泼墨,每一笔都藏着专属的温度。如今,印刷的春联琳琅满目,烫金的字迹、吉祥的图案,是现代人的喜庆。也总有像我大哥一样的人,坚守着手写的传统,根据自家的期许落笔,给新的一年留下第一枚欢乐的印记。这些年的春节假期,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各地习俗的差异有多大,春联于我而言总是一道永恒不变的风光。它早已超越了祈福的本意,成了文化传承的符号。

除夕傍晚,我从外地返回家。从小区大门到单元楼道,再到每层的每家,鲜红的春联次第闪亮。这红联是千年习俗的缩影,是先祖馈赠的信物。它穿过岁月长河,在现代生活里依旧熠熠生辉,映着新春最深沉的期盼。



烟火年年(中国画) 杨可 张琳

# 满庭芳

第五四九期

清代《津门保甲图说》中有记载:“杨柳青者,西南一巨村也。《河间志》谓即柳口,地最冲要。旧志云:‘以地多杨柳故名’。设驿于此。滨河控道,水陆皆通,街巷村户俨然成聚。”大运河连通南北的漕运交通,促进了杨柳青的发展,塑造了历史上杨柳青水陆交通、杨柳繁茂的自然景观,商榷林立、院落密布的城镇格局,以及庙宇鼎盛、年画蔚然的文化景观。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和杨柳青古镇双重文化资源,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势在必行。从2019年开始,我们团队有幸参与到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元宝岛城市设计中,旨在将其打造为天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杨柳青核心展示园。

前期的准备工作很重要。在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公众积极参与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文史专家研讨机制,进行杨柳青历史文化价值的评估。翻开《津门保甲图说》,曾经的繁华已尽数描绘:杨柳青因河而生,因水而兴。以东、西渡口为核心,自发生长出生活聚落,在运河的南北两岸形成河一沽一合一田一庙一村

的典型空间格局。随着贸易的繁荣,聚落的扩大,发展为数十条街胡同,成为中国北方运河城镇发展高度的里程碑。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进程,杨柳青的城镇空间格局发生巨变,元宝岛在2008年整体拆迁后,仿若变成一座孤岛。面对这样的情形,初始设计时我们一度感到困惑,难道曾经的运河胜

景只能深埋于故纸堆中吗?在元宝岛上,如何重塑地域精神、传承千年文脉是设计中需要深深思考的课题。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纹一样,所有的土地也有固有的地文——有些是自然留下的,有些是生活刻下的。敬畏历史,敬畏运河,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地文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依据。

在褪色的年画中,依稀可见当时的运河胜景;在空旷的土地中,还能寻找到历史的痕迹;在古老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六) 年画鼓了:元宝岛的入画之旅 刘晓宇 黄晶涛



的地图中,不同年代的航拍里,可以探寻到运河流经元宝岛的脉络。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元宝岛项目将千年岁月长河中的历史景观要素层层叠积,整合出地文基底,传承“沾水村台”的整体格局,延续“依渡口而生”的村镇肌理,中部“留白”再现湿地景观,承接“斜街柳巷”的运河城镇肌理,在“村台”上落位公共建筑。规划以“从年画里来,往年画里去,让世界沉浸在年画里”为设计愿景,让历史的记忆再塑美的

年节风俗,一般是指与春节相关的各种习俗活动的总和,包括祭祀、拜年、娱乐、饮食等多方面。其萌芽于先秦时期,定型于汉魏时期,确定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活动,如贴门神、挂桃符、驱傩等。随着儒家思想渗入其间,开始出现祭祀祖先、依次拜贺等伦理活动。唐宋时期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如守岁、立门神、挂年画、贴春联、拜年、元宵节等,同时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佛教、道教等文化元素也融入春节习俗中,出现了元宵灯节、佛教燃灯等活动,春节习俗更加多元化。天津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素称“五方杂处”,来自各地的居民,将不同地区的风俗带到天津,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天津风俗,尤其是年节习俗。

老天津有句俗语“过了腊八就是年”。可以说,腊八是旧历新年的开始,相传这一天是佛爷出家的日子。每家在前一天就买好各样的米、豆、栗、枣等,或八样,或十样,是日很早便起来,杂而煮之谓之腊八粥。因此,进入腊月,天津街头便会出现售卖“腊八米”的,就是在提醒人们“腊八快到了,快买点米豆熬粥去吧”。富足之家则以腊八粥馈赠亲友。故,清代乾隆年间《天津县志·风俗》记载说:“初八日,以米豆栗枣煮之,曰腊八粥,兼谓贫人。”有些为了增福儿女发有誓愿的人家,则在这天早晨大行施舍结绿豆和腊八粥等与路人。对于“腊八”这一天的习俗,老天津人很是信守。1933年的《益世报》就说:“国难紧急,市民依然过腊八。”

然后就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清末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曰:“二十三日,祭灶,谓灶神上天。”家里用火做饭的地方是灶台,祭灶时敬祀的神仙是灶王,供品是糖瓜。昔日天津,从阴历腊月十五开始,大街小巷的油盐店、杂货铺、南纸店、百货摊都在代卖“灶王爷”,其灶王像大多来自“版画之乡”杨柳青,画面给人们以庄重的感觉。

近代天津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李金藻在《天津过年歌》中有很多形象的说法:“还有一个纪念日,就是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灶王照例的要上天。恐怕上天不说好话,灶王的嘴所以要粘。依吾看,打灶的偏媚灶,这叫作心苦嘴甜。好在往返不过一个礼拜,换一副新门面,再受那旧香烟。”腊月二十三祭灶日,表明开始“忙年”。从这一天开始,家家都忙碌起来,洋货店、香码店,也要拥挤得进去。除了购置年货外也忙着蒸馒头、花糕一类。正所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到了除夕那天,便是过年最热闹的刻。民国时期《新校天津志·风俗》记载说:“除夕,多嫁娶。易门神,插芝麻秸于壁。辞岁祭祖祢,祭品较丰盛,家人设酒守岁。”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曰:“除夕,接灶,祭神,祀祖先,拜尊亲,曰辞岁。夜饮不寐,曰守岁。”这一天人们都起得特别早,作为“一家之主”的老人就会带领子侄辈把春联贴上。考究些的是用木材做的“对子板”,用铜钉装在大门上,字句多是诗书礼乐或福祿寿禧之类。之后,门头悬上宫灯、彩绸,墙上挂了壁灯,屋门二门上挂上红色的“饺子灯”。悬灯结彩之后,把应景的“吊钱”贴在门窗的外面。那种用红色棉纸制成的剔透的花笺,镶着“五世其昌”“金玉满堂”等字句,表现出天津的风土人文气息。妇女和孩子们则是梳洗打扮换新衣,从衣服到鞋袜几乎全都是红色,取意吉祥与辟邪。孩子们说话更要特别小心,不准说一句不吉利的话。

天黑后,全家老幼都要祭祀祖先,晚辈要向家中长辈磕头,谓之“辞岁头”。长辈给晚辈钱,谓之压岁钱,然后一家人围坐桌前,把早包好的饺子煮了,多多地盛几碗。如果家中有人外出,也要给他摆一份碗筷。吃的时候总要剩下一点,是希望这一年到头东西总有余裕的意思。无论贫富人家,这一夜大都不睡觉,谓之“守岁”。大多是做各种试运气的游戏,看一年来谁的运气佳。民国时期,随着一批娱乐设施的兴起,公共娱乐活动增多,如电影院会举行“迎春夜”或“守岁场”活动。在过年夜,像卖带子、筷子、糖葫芦、糕干等的摊位特别多,吆喝声,叫卖声很是热闹。如子孙稀少的人家就要买筷子和带子,寓意很快就能得子。新妇的娘家也要买些糖葫芦等类食物给姑娘送去,这是因为糖葫芦取其子孙万代的意思。

大年初一过新年,晚辈要给长辈、祖先磕头拜年,也给同族人拜年。三五成群的大人小孩,全都穿戴得焕然一新,分途去拜年。遇见认识的人,都要彼此说一句“见面发财”。清末民初天津文人赵光宸在《津门岁时记》中写道:“初一一日,谚谓之‘大年初一’。黎明,长幼皆起,衣华服,设香烛,拜祖先及父母以次,曰拜年。更同食素馅饺子,更取新交子之义。”清末天津诗人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也描写了过年的热闹氛围:“辞岁迎年一夜熬,烧香早起好登高。鼓楼可揽全城景,老幼扶持不惮劳。”

包括天津在内的各地区的年节风俗,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也是凝聚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年节习俗仍深深深刻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元宝岛一期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图

元宝岛一期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图

元宝岛一期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图

元宝岛一期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图